



# 我的高考记忆

编者按

高考,是青春里一场特殊而又深刻的洗礼。它或许意味着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无数道反复推敲的习题,也或许承载着关于梦想、关于未来的无数憧憬。我们深知这份考验的分量,也理解此刻你们心中可能交织的激动与忐忑。

为记录这一特殊时刻,本报特推出“我的高考记忆”专版,邀请一批你们的“前辈”,回溯自己的高考故事,分享那些或激昂、或温馨、或深刻的青春片段。这些故事,或许与你的经历有所不同,但其中蕴含的拼搏精神、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底色。

亲爱的考生们,请记住,无论结果如何,走到今天,你们已经是最棒的!那些为梦想付出的汗水和努力,都将成为你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相信自己,沉着应答。祝愿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 1978,我的高考

张建雄

1963年,我考入攸县一中,在高13班学习。经过三年紧张的学习,1966年4月,我们进入了毕业考试阶段,进行高考复习,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

数科风云突起,全国停课闹革命,高考停止,我们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1969年元月,新市老街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自我找门路,全体下放农村,我和母亲、嫂子等4人落户于易清潭大队,那年我22岁。

下放农村以后,栉风沐雨地为生活而努力,一切豪情理想,俱已烟消云散,一切锋芒抱负,都已付之东流。不久,我成为生产队的民办教师,上课时教书育人,课余时间外出务工,并担任生产队会计一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员。

转眼到了1977年,其时我已届而立,膝下有几女各一。这年的10月21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听闻此消息,我百感交集,旧梦蠢蠢欲动,当下便跑到县教育局报名。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从镜片里扫视我一眼,当场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我已超龄,超过25岁的,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有特殊贡献的才能报名。我一个普通知青有什么“特殊贡献”?这不是胡扯!失望之余,也不想理论,只能乘兴而来,悻悻而归。

1978年夏天,高考又要开始了。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兴冲冲地跑去报名。这次竟出乎意料地报名成功。其实,报名时,我内心很是矛盾。我想,即使我考取了,我能顺利上学吗?家中一贫如洗,我若去上学,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该怎么生活?但我管不了

这些,只一味想要考大学。我找来一些复习资料——主要是数学资料,语文、政治、史地则无法顾及,外语因不记入总分,也不用考,就更不用理了——开始在课余工后埋头复习。

1978年7月20日—7月23日,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如期举行。新市地区考场设在新市中学,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在考试中,当时的公社秘书刘乾龙多次关切地站在我身后,看我答题,身旁自有一股暖意。记得数学考试时,要用上一个公式,但我偏偏忘记了,最后,我在草稿纸上硬生生用倒推法推导出公式,当时真有点欣喜欲狂的感觉。

考试结束后,殚精竭虑的我,感觉大脑就像空了似的,整整在家睡了两天。

阅卷工作在湘潭举行,新市中学语文老师朱韶先参加了历史科目阅卷。那时的高考试卷,考生信息未密封,一切一目了然。阅卷完毕以后,朱老师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你的历史试卷轰动了整个阅卷场,阅卷老师争相传阅你的试卷,惊叹你在举例说明古今中外三次突然袭击的战例中,连日本突袭珍珠港的细节都能说清,明确指出战争发生在星期天,令人惊叹。我笑了笑说:碰巧罢了,我恰好有一本这样内容的书,有兴趣,就记下了!

不久,高考成绩公布。我也记不得我考了多少分,总之是上了全国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考古系。真的,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填写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志愿。不久,高考录取体检开始了。体检地点设在新市原种场的一排平房

房里,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在五官科检查室,负责体检的是菜园坪的一个医生,一进门,坐下,抬眼扫视了我一眼,又盯了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突生一份寒意,他刷刷地在体检表上写了些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告诉我,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接着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其实,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是那么期待。因为以我的家境、年龄,确实是无法上学的。但我也希望得到一个结果,也许是圆一个梦,弥补一下人生的遗憾,也许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等等啊,录取工作都结束了,却依然没有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

哥哥在长沙知道了这事,趁出差的机会,专程到湘潭市招生办进行了查询。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录取是因为身体原因。整个湘潭地区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录取的有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也释然下来。一个人,只要努力了,就心安理得了。

后来,我考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职学习。那时农村鲜有大学生,也不知什么是电视大学,我上“电大”竟成了当地新闻,不少人在路上向我伸大拇指。再后来,我又转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函授专业,终于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似乎圆了我的大学梦!

1992年,我调入攸县三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学。十几个春秋寒暑,送往迎来,和同仁们把一批批学子送入高考考场,心中的那份欣慰和满足,是不可言喻。我的学生们,既是圆他们自己的梦,也是圆我的梦。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 与高考有关的日子

谭德宇

三十年后很多次,努力搜寻当日最后一次走出校门的情景,却几乎想不起来。只记得离开时,我背着一个蛇皮袋,日光照在旧衣衫上。那天,路旁石榴花落了满地,我头也没回。

昨日,附近的同学高考结束后都走了。新市的文同学校单车坐垫被偷,他仍坚持站着蹬回家了。只有我们这些偏远地区人士,仍滞留学校。晚上在老陈处吃了一碗饭,菜里仍然没有油,此人扼守要津,每晚提篮在宿舍门口卖烧饼。学生中多有奸人,故意掏出大量一毛纸币。当他手忙脚乱数钱时,早拿烧饼跑了。

1990年秋天,校园道路两旁的广玉兰开得又大又白,我们升入高三了。教室从后栋搬到前栋,红砖屋子的一楼。听闻邻班某女生不参加高考,要去美国了。女生返回学校与大家辞别,很多人特意去看未来的美国人长什么样子。他们回来说,比去美国真的挺远,比县城到柏市还远。

一位艳丽的女生,好像已办好了某单位上班,每天踩着高跟鞋来上课。总爱迟到,报告后身形一扭一扭,袅娜地到达自己的座位。理科班的同学大多都是热血青年,搞得楼上如野猪经过,一周罢课几次,一会说这个老师不行,一会说那个老师不行,实在热闹极了。

两周后,突然又换了一年教室。在二楼,横向,可容九十人之众。班主任气宇轩昂,神气活现,戴着茶色眼镜,穿着江峰同款皮裤——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攸县街头颇为少见——裤裆总是开着,据说每天赶时间上班,猛踩自行车所致。上课从不带书,拎着一本旧教案,拿起粉笔信手在黑板上画各国地图,无一修改。

语文老师穿长袖白衬衫,里着红背心,黑长脸,疾恶如仇,性如烈火,是个老派硬汉。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愤懑感,课堂上走个不停,一边讲课,一边骂人。稍不如意就暴走,最惊世骇俗的名言是:你们这群造粪机,你们这群造粪机……

点名背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怒号……”“滚!”我刚开口,一棍棍打来,便赶出了教室。刚走几

步,忽闻身后有人呼唤:哎,等等我。凡兄笑嘻嘻款款而来,我也被赶出来了。这个上午,我们在后山吹吹风,听水声,顺便缅怀了一下柏市乡贤,拜谒了老校长张德光先生之墓。

我这种思想落后的游离分子,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自然未能共襄公车上书的壮举。估计老师知道此节后比较感动,用鼓励来回馈当日不杀之情分。

这似乎也是三年来仅有的一次来自老师的安慰和关怀,这些许善意像学校食堂旁那个井水龙头,虽然不多也不够,但能给干渴的学子带来甘甜。

高考前夕,星空浩瀚,想起前路渺茫,不禁自伤,居然一夜不眠。语文考试前昏昏沉沉,魂飞魄散。凉凉贺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望,从口袋里掏出几根人参。幸得贺同学分我两支,一边嚼着一边看完。考生中也有复读生,这些家伙非常胆子大,而皮厚,看到老师在操场办酒席,经常翻墙进来,混入其中蹭吃蹭喝,推杯换盏。

但面临高考,他们承受非常沉重的精神压力。一位考生,几天吃不下饭,连喝几瓶补脑汁,结果把自己干翻了,直接从考场摔到医务室抢救。英语考试最后十五分钟,突然一阵妖风,将一考生答卷卷起,伊然直奔窗外之势。考生哭喊着,满考场张牙舞爪捉拿,总算在窗玻璃上摁住,结果卷子揉烂了。待换得新卷,时间紧迫,那位考生边填边哭,啜泣之声,惊心动魄。

公布成绩前晚,邻家兄弟带一凉席来到学校后山,卧听江水鸣咽,辗转难眠。成绩公布后,拔腿就跑:考中啦,考中啦。跑到三公里外的车站,心中揣揣:我会不会看错啊?备受煎熬后,又跑回看公布栏。

每个人都有一个进不去的母校,穷尽口舌无济于事,就是不让进。想挣扎一下:我们家几代都在这里求学,看看行不行?不行!偶有一两回,蛰伏于老友的黑车上,偷偷溜入校园,看看来往红男绿女,意气风发,却不认得一个人。

天地间的风不停吹,吹绿攸水两岸芳草,也吹落灵龟峰的香樟黄叶,从白又到黑,从南又到北,催生也催死。只是这风太大了,将这校园里关于1991年的人和事,全部吹得干干净净,连同汪国真、席慕容的诗,三毛的撒哈拉故事,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和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 赶考

谭圣林

“我们不仅需要培养能写会考的学术学霸,也需要培养手脑并用的巧工匠匠。我们既需要‘在正道上行’的研二代研三代,也需要心怀‘国之大事’的技二代技三代。”

作为一名教育服务工作者,我时常在一些活动中表达一点看法。说给别人听,不腰疼,但面对实际,就没那么硬气了。

儿子中考中等,就读市里这所处于中等方阵的高中,算是妥妥地对号入座。入校时,按照流程,没怎么排队折腾,办好了报名缴费入校领书等手续。倒是一旁赶来赶去搞总调度的校长,白衬衣汗流满身,让我这样的家长对学校平添了几分敬意和放心。

儿子学文科,班上女生占八成,考试成绩绝对占上风。整体上阴盛阳衰,是目前教育的一种现象,一直延伸到考研考公。像儿子这样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不断的男生角色,没有女生那样自律,要心眼的事一股脑全干过,譬如积攒伙食费买手机,弄个手机模型上交糊弄班主任,躲在厕所里组团玩游戏。班主任说,男生早就结成加密死党,互相之间绝不背叛,家长很难探到实情,斗智斗勇后,只能平胡。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有几次下午去接儿子,久等不来,以为是高三紧张,赶课加餐。走近校门,透过栏杆望去,儿子正在操场三步跨栏扣球,大喝一声喜得三分好球,与他一起打得火热的,清一色高二高一的男生。高三班上的同学回家走路坐车都拿本试题集在啃,儿子却在水泥球场上挥汗打球,且成为常态,真是让人意难平。

躁动的家委会在内卷中持续发力,复印往年高考题,探索新版模拟题,筛查各类培训班,更走心的,画出几条像股市K线图的抛物线,分析名校升学率走势,研究各类题型分值率,真是掏空心思,堪比专家。这些家长不少是把孩子从县里转到市里的,租房,请人做保洁,一个星期赶一趟市里巡查,风雨无阻,举全家之力马拉松式投入,生怕落后一分一秒,耽搁未来的阶层跨越。

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划粥断齋,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发于刚,发于型,发于行。儿子说,这些心灵鸡汤完全理解,只是不能完全切换到脑子里。

月考后家长会上,班主任和校领导要大家提点建议。百分之九十九的是要求导入名校名师资源,节假日加班自习,高密度赶进度刷题。唯有我弱弱地替儿子提了一条,能否每周保持一节体育课和一节音乐课,让孩子活动活动轻轻松松,遭到众家长白眼,嗤之以鼻一笑。校长接着我的话,来了句更狠的论调,你们家长提的这个那个,合适的合适的,我们都想到了。我们的态度是,一概不予采纳。乍一听,觉得校长傲慢到天花板,但话里透露的严厉和自信,却让家长心里踏实舒服。

高考那天,我们借住在考点学校旁边的亲戚家。头天赶到,我把车子停在路边大樟树下阴凉处,以确保用车时不烫屁股。亲戚家除了备菜摊,还强势出面,说服开麻将馆的邻居,以牺牲每天几百元茶水费的代价,安安静静停业两天。邻居及麻将也都顾全大局,纷纷配合,让我生出几分感动。

难不难,考得怎样?几场考试,我不敢问这样心梗的话,问了也没用,只愿埋头搜索食谱,备好防暑药品,帮着炒菜煲汤,把房间空调调到适中。做父母的,除了搬砖式后勤服务,其他的,也操心不了。

但操心人一直在行动。临考前,班主任抱着一捆钢笔,赶路几百公里,去祈福加力,回来后给每位同学发一支开过光的钢笔。开考期间的校门更是神仙出没,赶麻雀赶了,的赶车赶行人的,简直不能太疯狂。当爸爸的穿着错位的旗袍,在大红的高考对联前接二连三闪现,指望旗开得胜,胖妈妈穿着绿色衣服,推着一路绿灯,老人家手举向日葵,期望孙子一举夺魁。

我在警戒线外靠边站,一阵唏嘘。高考结束,铃声骤响。儿子没有冲锋,没有拥抱,更没有嚎叫,只是像平常一样走出校门,开车门,上车。儿子自评说,过得去。又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感觉。

两条在车子底盘下摊直身子贴地安睡的大黄狗,被嘈杂惊醒,探出头,伸了个懒腰。也许,它们熬夜守家守家。我对儿子说,这一向,你累得像狗。儿子说,现在可以像狗一样,透口气了。

儿子最终被省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中文专业录取。自我戏谑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儿子所在中文专业班,仅他一名男生。大学毕业后,或许一贯平常心的缘故,儿子没有赶着去考研或是寻找出国留学的门票,正巧赶上考公,文科专业占优势,儿子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直接上岸。后来侧面听面试官说儿子个子大,颜值高,很阳光,同等条件下赶起了一回厉害女生——看来,没有一种选择和付出,会是白搭,包括阅读打球跑步,甚至聊天旅游看电影,总会给你存下一笔能量,遇到合适的温度,破壁发光。

体检,政审,考察。目送儿子大步走向工作单位的背影,不禁泪眼朦胧。原来,人间最柔软的,是一次次赶考路上挂牵的父与子。

## 三战高考

黄小平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攸县二中度过六年中学时光。二中坐落在县北的金盆岭,绿树成荫中隐现着一排排平房校舍,以主干道为界,东边是初中部,西边是高中部。二中的特色是树多,香樟树油茶树郁郁葱葱,夹竹桃木芙蓉灼灼其华,校园里还有几株本地少见的铁树。铁树长在老办公楼前,树干粗壮,羽叶光亮硬铮。据说某年铁树开了花,当年学校的高考成绩大放异彩,惊艳全县。后来学校大兴土木,建了新的办公楼、教学楼和宿舍楼,建楼的时候移动了铁树,传说那几株铁树是学校的吉祥物,移动铁树于风水不利,这应当是牵强附会之言,不过此后几年学校的高考成绩的确走了下坡路。

1989年秋天,高三前夕,我们搬进了新教学楼,开始高考前的厉兵秣马。当年有两个文科班和几个理科班,每个班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除了我们这些应届生,还有很多复读生插班进来。那时高考是农村孩子最重要的出路,但高考录取率极低,落榜是常事,复读也是常事,复读一年的很多,两三年的也不少,听说最多的有八年,号称“八年抗战”。

高三的生活很紧张,我和同学们每日清晨便被广播声叫醒,快速奔到宿舍楼前的花坛边,找到自己的水桶洗漱,然后小跑到操场做早操,随后到教室早自习,开启一天的学习。二中的学风虽然浓厚,升学率却并不高。听老师说,全省高考大中专上线率只有10%,作为县级普通高中的考生,都不敢期待考上本科,只要上了中专线都会觉得庆幸。那时流行一句话:“管它中专大专,哪怕是块‘土砖’也要抱着。”意思是只要能考上,管它啥样的学校都要去。

1990年7月,我们如期踏入高考考场,遗憾的是那所学校总体成绩较差,理科班还好,两个文科班没有一个应届生上线,只有一些复读生考得较好。记得出高考成绩的那天,阳光耀眼,天气炎热,同学们一大早就赶到学校,三五成群地在香樟树下等候老师播报成绩,听着广播里报出的分数,大家脸色都不好了。有的同学不再读了,大部分人选择换一所学校复读。我也就此离开二中,去了三中复读,准备“二战”。

这一年深秋传来消息,根据国家高考改革通知,1991年“三南”(湖南、海南、云南)高考由以往的文理两科改为文史、理工、地矿、农医4类,每类只考4门科目,我选了文史类。我的成绩在文史复读班上算是较好的,预估上线应该没问题,考得好的话也许能上个本科。意外的,那年高考我发挥失常,再加上考政治时,有道高分值的论述题单独在最后一版,我竟然没看到这个页面,其实这道题我是会做的。如此一来,自然名落孙山。

父母决定支持我来年再考一次,准备“三战”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不过,这年秋天,县里不让中学接受往届生复读,于是刚去学校不久的同学们只得回家自学。直到晚秋时节,镇上组建了一所临时复读学校,条件很是简陋,来读书的同学却挺多,文史班有一百余人,老师是从三中过来兼课的。学校的管理并不严格,不过同学们都自觉用功,勤学钻研,直至又一个七月来临,踏上高考考场。

这是难忘的1992年,也是对往届生最艰难的一年——此前此后往届生和应届生都是同一个分数线,而1992年往届生的分数线却要比应届生高出若干分。

成绩揭晓之前,我没有估分,那时没有网络,不像如今高考后马上能在网上看到试卷与参考答案等待出分的半个月里,我在家里帮着干农活,正是“双抢”时节,每天都忙得大汗淋漓。那年的志愿是考前填好的,我记得自己来读书的志愿填的是北京戏曲学校,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我和姐姐聊天,说“今年如果考上了,不是去南京就是去北京”,如果没考上呢,我也想好了,去学裁缝,做服装设计,人生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家里人都在猜我的成绩,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跟他说“7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出成绩那天,我去学校,碰到老师,告知我的成绩非常好,高出往届生重点线7分。我不去上学裁缝了,不久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则感叹:“梦得好神奇啊,原来是高7分!”